

# 唐高祖三許立太宗辨偽

李樹桐

## 一 引 言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六二二）十一月記曰：「上（指唐高祖）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同書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七年六月又記曰：「（楊）文幹遂舉兵反……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

暫時假設以上的記載爲真，綜合起來，唐高祖許立太宗爲太子（或世子），前後凡三次之多。簡言之：

第一次：因太宗首謀起義，高祖以他有功而許立他爲太子。

第二次：因將佐之請，高祖將立太宗爲世子。

第三次：因楊文幹反，建成與謀，高祖令太宗平亂而許立他爲太子。

每次高祖許立太宗，都是根據前面的一件事故（並非事實）而發的。前面的事故，就是高祖許立太宗的起因。倘若前一事故爲真，則高祖許立太宗事即屬可信，倘若前一事故爲虛構，則高祖許立太宗事便喪失根據而不會發生了。換句話說：即可判爲偽造。因此，欲判高祖三許立太宗事的真偽，必需先察其以前的事，現在分別研究如下：

## 二 唐高祖初次許立太宗辨偽

關於太宗首謀起義事，舊唐書高祖本紀說：「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新唐書高祖太宗兩本紀有較詳的記載。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卷一百八十三記載更詳說：「……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劉）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裴）寂曰：『此非常人，當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指隋煬帝）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

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數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並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並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親天時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並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見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宜從之耳！」帝（指隋煬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密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都勒將發。」

以上記載，暫時假設爲真，這整套的太宗首謀起義故事，可依前後次序排列爲以下的四個步驟：

第一步驟：太宗入獄見劉文靜共議大事。

第二步驟：太宗劉文靜設計聯絡裴寂，託他向高祖關說。

第三步驟：裴寂受託後，乘高祖酒酣之時，說明太宗欲舉大事，得到高祖的允許。

第四步驟：王仁恭高君雅爲突厥所敗，高祖懼獲罪時，太宗乘間直接勸說高祖。

第一步驟太宗入獄見劉文靜共議大事，雖未說明時間，但據劉文靜所說：「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兩句話，可知時間必在煬帝已南巡江淮，李密已圍逼東都之後。據隋書煬帝本紀，知煬帝南幸江都，係大業十二年（六一六）七月事。舊唐書李密傳載李密幕府祖君彥所作數煬帝十罪檄文說：「魏公（李密）聰明神武……遂起西伯之師，問南巢之罪，……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由此可以斷定：太宗入獄見劉文靜的時間，必在大業十三年（即義寧元年西元六一七）四月二十一日以後。

第二第三步驟的時間，依理當然在第一步驟之後。

第四步驟太宗直接勸說高祖的時間，只說明在王仁恭高祖雅為突厥戰敗，高祖懼罪之時。王仁恭為突厥所敗的時間，北史王仁恭傳，隋書煬帝本紀以及新舊唐書高祖本紀，突厥傳等，都未載明。依理推斷，必在唐高祖任太原留守之時。舊唐書高祖本紀云：「（大業）十三年，為太原留守，」大唐創業起居注說：「煬帝後十三年，……突厥知帝（指唐高祖）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祖雅將兵與（王）仁恭並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縱，遂為突厥所敗。」可知王仁恭為突厥所敗的時間，在大業十三年正月初一以後。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三年載：「二月己丑（初八日）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可知王仁恭於二月初八日被殺，則王仁恭為突厥所敗之時，又必在二月八日以前。

前面已經斷定所謂太宗首謀起義的第一步驟——太宗入獄見劉文靜的時間，在四月二十一日以後了。而太宗直接勸說高祖，是第四步驟，怎能發生在二月八日以前王仁恭戰敗之時，反在第一步驟之前呢？這是不可解的矛盾，決不可能的事。

劉文靜對太宗所說：「李密圍逼東都」的話，是配合着「主上南巡江淮」而說，不是發言的主旨，這一句可以破壞全套太宗首謀起義故事的話，竟排列在劉文靜發言的前面，決不是作成全套太宗首謀起義故事的史官所偽造，而是劉文靜確曾說過的。是絕對可信的。

通鑑卷一百八十三，義寧元年（即大業十三年）二月載：「庚寅（初九），（李）密（翟）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這是李密欲攻東都洛陽的開始行動。王仁恭為突厥所敗之時，尚在此時之前，太宗入獄見劉文靜的時間，更應當遠在此時之前，纔能合理。可是那時，李密根本沒有開始攻東都的行動，下在獄裡的劉文靜，怎能會說出：「李密圍逼東都」的話來呢？根據這點，一方面更可以證明：太宗入獄見劉文靜的時間，確切在四月二十一日以後；另一方面，更足以證明：在王仁恭為突厥所敗之時（二月八日以前），不可能有太宗直接勸說高祖（太宗首謀起義的第四步驟）的事發生。

舊唐書劉文靜傳說：「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可知劉文靜在高祖鎮太原以後，尚且和高祖「深自結託」了一番，然後高祖奉煬帝令纔把他下到獄裡的。劉文靜下獄的罪狀是與李密連婚，必定是由煬帝注意到李密所引起。李密自大業九年為楊玄感謀主失敗後，一直在潛藏着，到大業十二年，纔又往依翟讓。隋書卷四煬帝本紀大業十三年（即義寧元年西元六一七）二月載：「庚寅（初九）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庚子（十九）李密自號魏公。」這應當是引起煬帝重新又注意到李密的大事。遠在揚州驕怠惡聞政事的隋煬帝，在近臣掩蔽相蒙之下，重新注意到李密，當在李密陷興洛倉以後。煬帝再聯想到（或聽人報告）劉文靜和李密連婚

(260)

而命令鎮守太原的唐高祖把他下在監獄裡，時間最早也早不過二月中旬，晚則到三月或四月裡了。

在大業十三年二月中旬以前，劉文靜既是還未入獄，在二月初八日以前王仁恭爲突厥所敗之時，劉文靜更沒有入獄。那末，太宗那時怎能入獄見劉文靜呢？所謂太宗首謀起義的第一步驟，不能實現於同一套故事的第四步驟（太宗乘間直進勸說高祖）之前，則第二步驟（太宗劉文靜設計聯絡裴寂）第三步驟（裴寂乘高祖酒酣說明太宗欲舉大事）更無法在第四步驟以前實現。如此，則所謂太宗首謀起義的一套故事，便不可能成立爲事實。

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創業注）卷一載：「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也，帝（唐高祖）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業，奉使安民，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者歸心，有如影響。」由「私喜此行以爲天授」一語，已可表現出高祖早已萌起義之念了。

同書同卷又說：「煬帝後十三年，敕帝爲太原留守，仍遣獸（唐諱虎字）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帝遂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據此可知高祖在來太原時，已將「取而不與，禍將斯及。」的話，告知他的愛子世民了。

考創業注一書，係溫大雅所著，他是高祖起義時大將軍府的記室參軍，專掌文翰，後來太宗即位，他累遷禮部尚書。舊唐書溫大雅傳說：「太宗以隱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秘策，甚蒙嘉賞。」可知大雅是擁護太宗，得到太宗嘉賞的，自然沒有隱沒太宗之功而不書的道理。而且大雅任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創業注是他親自親聞的記錄，所記前後三百五十七日間大事的干支，大體都和新舊唐書通鑑相符合，全書對太宗無一字的貶辭，足證其所記真實可信。

創業注所記既爲真實可信，則太宗已知高祖之謀，他於四月二十一以後入獄見劉文靜，應當是奉高祖之命和劉文靜有所商談，而不是所謂「與君圖舉大計。」觀舊唐書劉文靜傳所載：「文靜曰：『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爲公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囑集，可得十萬……』」的話，可證太宗問劉文靜的，是他能否號召地方實力，而不是如何推動高祖。益信所斷之非虛了。

創業注所記既爲真實，則所謂「太宗首謀起義」的一套故事，全爲不必要的行動。對於不必有，而且不可能有的一套故事，通鑑裡竟大書特書，必是司馬溫公誤採了以前史官另有目的的偽造。

太宗首謀起義的一套故事既爲偽造，則高祖所說：「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的話，完全失去根據了，所以斷定這話亦必是偽造而非事實。

### 三 唐高祖二次許立太宗辨偽

通鑑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記曰：「及（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以上的記載如係真實，應當根據以下的條件：

（一）太宗有特大軍功而太子建成無功。

（二）太宗結納一些人才，和將佐們已結成集團。

（三）高祖特別寵愛太宗而不喜建成，將佐迎合高祖的心理。

如果這三個條件不是事實，則將佐請立世民爲世子事便失去根據，而高祖將立之的事，亦必爲虛構。

考高祖進封唐王時，係義寧元年（六一七）十一月甲子（十七日），上距克長安的丙辰（初九日），只有八天。距太原起義的五月甲子（十五日），剛有六個月零兩天，實際只有一百八十天。所謂太宗首謀起義既已證明爲虛構，則在那時，太宗並沒有多年來治史者所誤認的大功。由太原向外擴展的第一步是克西河，而克西河爲建成世民共同之功（創業注明記着：「六月甲甲，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西河）。太宗實錄只云命太宗取西河，司馬光通鑑考異已考定其非。」）其次的重要戰爭是克霍邑，而克霍邑前，「大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創業注卷二）建成世民軍功亦相等。及高祖率軍西濟河後「遣隴西公建成司馬劉文靜屯兵永豐倉，兼守潼關，以備他盜。太宗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前後數萬人自渭北徇三輔。」（舊唐書高祖本紀）和「命太宗自渭南屯兵阿城，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趣霸上。」（同上）建成和世民兩個的軍功還是大致相等的。

最重要的戰役是克長安。關於攻克長安事，創業注卷二記曰：「十月辛巳，帝至塢上仍進營，停於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公建成二公諸軍二十萬會焉……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建成）主之，西面北面，建成公（世民）主之。……十一日（當爲月）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纔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這說明克長安時，建成的東面軍有先登城之功。克長安八天以後，高祖爲大丞相進封唐王時，建成的軍功確實較太宗爲高。諸將佐爲什麼不請立剛建克長安之功的建成，而請立功次於建成的世民呢？

太宗固然有不少的軍功，例如斬薛仁果（武德元年十一月），破宋金剛劉武周（武德三年四月），擒竇建德收降王世充（武德四年五月），敗劉黑闥（武德五年三月）防禦突厥（武德七年潤七月）等，但是時間都在高祖進封唐王的很久以後。諸將佐當然不能預料太宗以後的軍功，在事先請高祖立世民爲世子的。

太宗一生所結納的人才，以十八學士及圖像於凌煙閣的二十四功臣爲最有名，但考其履歷，在高祖封唐王時，他們還

沒有和太宗見過面的，佔絕大多數。計平薛舉父子後纔引用的，有褚遂良，褚亮等人。平王世充以後纔引用的，有李玄、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劉師立等人。平竇建德後所引用的，有虞世南，蔡允恭等人。但記「武德中」，或「秦府開文學館」（武德四年）所引用的，有薛元敬、顏相時、蓋文達、蘇世長等人。名將如秦叔寶、程知節、羅士信、李勣，於武德二年纔降唐，尉遲敬德於武德三年纔降唐。張亮是李勣所薦，張公謹是李勣、尉遲敬德所共薦，時間當然又在他們降唐以後。以諫諍著名的魏徵，直到武德九年建成死後，纔事太宗。能斷大事的杜如晦，也是高祖稱唐王，太宗改封公以後纔引用的。

最有名的大將李靖，雖然在高祖克長安後，見到高祖太宗較早，但是那時他是與高祖有私怨，被執幾乎被斬而赦免的人，那裡有參預朝議的資格？劉餗隋唐嘉話說：「太宗將誅蕭瑄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九年以後靖的態度尚且如此，當時自然更不會參預高祖太宗父子之間的事了。

舊唐書房玄齡傳云：「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策杖謁於軍門。」同書段開山傳云：「從隱太子攻克西河太宗為渭北道元帥，引為長史。」顏師古傳云：「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煥煌公府文書。」可知在高祖初稱唐王時，他們和太宗的關係還是極淺的。趙郡元王李孝恭，是太宗的族叔，柴紹是太宗的姊丈，他們和太宗的關係，並不密於和建成的關係，對於立世子的大事，他們也不便提出意見左右高祖的。

和太宗共事較久，比較接近的，有段志玄、劉政會、長孫順德，劉弘基等人。而舊唐書段志玄傳說：「從平霍邑，絳郡攻永豐倉皆為先鋒，歷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及屈突通之遁，志玄與諸將追而擒之。」同書孫順德傳說：「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順德追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可知高祖封王之時，段志玄、劉弘基兩人都不在長安。劉政會於平長安後，除丞相府掾，不隸屬於太宗。劉弘基是一個「盜馬以供食」的亡命之徒出身，素無政治謀劃的人。對於請立太宗的事，也不會單獨有所主張的。

按與高祖的關係，請立世民為世子事，以高祖「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的裴寂，和「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託。」的劉文靜，最有資格。按與太宗的交情，以「少與太宗友善」的長孫無忌，和「與太宗周密」的唐儉，較有可能。但是偏查諸人的列傳，劉文靜正在「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絕無參與其事的可能，其他諸人的傳裡，根本不見有關此事的記載。

唐太宗是奪嫡成功得有天下的，請立世民應當是可記的功績，史家沒有諱言的必要，數十個功臣傳裡全無記載，當是絕無其事。如此，所謂「將佐請以世民為世子」事，必是託辭。

高祖對於他的兒子建成和世民，始終是同樣的愛，決沒有特愛世民而惡建成的現象。創業注卷一說：「帝自以為姓李

著於圖錄，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通鑑考異所引作耳語）謂王曰：『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義里之危，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孱弱，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建成携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這都足以表示高祖對建成的愛，並不亞於愛太宗。

繼此以後，高祖對建成世民凡事都是一樣。例如「李密遣使送款致書，請與帝合縱，帝大悅，謂大郎二郎曰：『……』」（創業注卷二），「帝顧謂大郎二郎曰：『爾輩如何？』」（同上）等等，都是明證。高祖對他們不只同樣愛護，對他們職權的分配，也大致相同。例如：「建大將軍府並置三軍，分爲左右，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統軍隸焉。太宗爲煬煥公，右領大都督，右統軍隸焉。」（舊唐書高祖本紀）「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寂勸兵各守一面」（創業注學津討原本卷二第十八頁）。「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煬煥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受其節度。」（通鑑卷一百八十四）以及「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煬煥公主之。」（創業注卷二）不一而足。

及克長安，「收陰世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於朱雀道，以不從義而又復焉。」（創業注卷二）只命隴西公而未提及煬煥公，可見高祖因建成有克長安之功而把他的職權加重一些。（武德元年）「正月戊辰世子建成爲撫寧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爲副。」（舊唐書高祖本紀）可知兩月以後，高祖的態度還是如此，諸將佐何所根據要請立太宗爲世子呢？

諸將佐既無根據請立太宗爲世子，便無請立太宗的事實，既無諸將佐請立太宗的事實，則高祖「將立之」亦必非事實而爲偽造。

#### 四 唐高祖三次許立太宗辨偽

關於建成與楊文幹同反之說，新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均有記載。通鑑記的更詳，茲錄於下：

「武德七年（六二四）六月辛丑（初三日），上幸仁智宮避暑……壬戌（二十四日）慶州都督楊文幹反。初……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墓勸之據城舉兵，態

(264)

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二十六日），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獲，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難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里。東宮官屬繼至，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嶺州。」

以上的記載假設其真，則高祖召建成詣仁智宮的時間，應當在楊文幹反的六月二十四日以前的三二日。而爾朱煥橋公山的告變，和杜鳳舉的詣宮言狀，更應當在高祖召建成詣仁智宮以前。換句話說：建成和楊文幹謀反案，在橋公山等告變之時，已經被發覺，建成已被牽連在楊文幹反案中了。但是經過仔細考察並非如此。

新唐書卷九十六杜淹傳云：「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並流越嶲。」舊唐書卷七十七韋挺傳說：「（武德）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宮。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宮臣潛構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構逆伏誅，辭連東宮，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嶲。」這兩段記載都明明說出：楊文幹案的辭連太子，是在楊文幹反以後，而且還在楊文幹伏誅以後：新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七年載有：「七月癸酉（初五日），慶州人殺楊文幹以降。」通鑑亦有同樣的記載。如此，則太子建成的被楊文幹案牽連事，是發生在七月初五日以後的。

依通鑑，太子建成的被牽連在六月二十四日以前，依新舊書杜淹韋挺二傳，太子建成的被牽連是在七月初五日以後，究竟應何所信從？要追究史料的來源。

據宋史藝文志和陳震孫直齋書目解題，均載有唐高祖太宗實錄（以下簡稱實錄），司馬光所作資治通鑑考異，時常引用實錄，可知司馬光作通鑑時，必定直接看到實錄。再據通鑑考異，凡新舊唐書與實錄抵觸者，多從實錄，可以推知通鑑所記楊文幹反案，當係根據實錄。考實錄係貞觀十七年（六四三）許敬宗等所修，而許敬宗的態度是：「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舊唐書許敬宗傳），許敬宗曲事刪改的標準，是「以己愛憎」，所以可信的價值極低（理由詳後）。

向來慣例，作傳均在其人卒後。杜淹卒於貞觀二年（六二八）。那時，高祖尚健在（高祖卒於貞觀九年），太宗尚沒去修實錄的計劃（計劃修實錄在貞觀九年），許敬宗還未注意到作偽。韋挺卒於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那時，實錄已



修成，（實錄成於貞觀十七年），作偽主角許敬宗，又被調他職（據許敬宗傳云：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權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敬宗與高士廉共知機要。）他既已因功陞遷，也不再注意到有關實錄的事，其他或前或後修國史及實錄的，皆當代名手，敬播、顧允、鄧世隆、慕容善行、孫處約等，俱爲修史學士（見二十二史劄記唐實錄國史兩次散失條）。據舊唐書敬播傳知敬播修史「頗多詳直。」其他諸修史學士，既受太宗的特別指示，所作的豈挺傳，亦未受到許敬宗的刪改（因許敬宗已調他職），也沒有作偽的理由和必要。因此，杜淹韋挺諸傳裡，對於太子建成被楊文幹反案牽連事，便自然而然的露出真實來。因此，可以斷定杜淹韋挺諸傳裡所記有關太子建成被牽連事，比較淵源於實錄的通鑑，可信的多。換句話說杜淹韋挺二傳絕對可信。

太子建成的被牽連，既確定在武德七年（六二四）七月五日以後，則通鑑所記的楊文幹反的六月二十四以前的種種包括橋公山的告變和高祖召建成詣仁智宮等）都絕對的不可能是事實。

新唐書卷九十八王珪傳云：「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嶺州。」通鑑記：「建成使郎將爾朱換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使表裏相應。」一段之下，司馬光加考異曰：「……劉餗小說云：『人妄告東宮』今從實錄。」王珪傳可信的理由，亦同杜淹韋挺傳，在這傳裡只說明珪被流嶺州的原因是「太子與秦王有隙，」而未說建成與楊文幹同反，劉餗更直說：「人妄告東宮」，歸結起來，可以說是：建成不會與楊文幹同反，但因與秦王有隙而被人妄告了。

劉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指餗及其父子玄其兄脫）更泄史官，著由例，頗有法。」（新唐書劉子玄傳附餗傳）。考劉餗的父親是唐代著名的史學家劉知幾（字子玄）領史官且三十年。餗脫，「博通經史，修國史」（脫傳語），既是「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而且玄宗時候距初唐不遠，想他對初唐遺存的史料，必甚熟悉，他既無如許敬宗一樣的作偽目的，他的所言，必有根據而可信。

王珪傳和劉餗的記載既屬可信，則建成與楊文幹同反說，實爲建成在楊文幹反後，受人誣告的牽連。如此，則通鑑所記建成和楊文幹同反說，全係根據許敬宗所作的實錄，其不可信甚明。

建成既不與楊文幹同反，則高祖何所根據而能對太宗說出：「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的話來？當然可斷爲偽造。

總觀通鑑所記的三次高祖許立太宗之前的事，全係偽造，則高祖三次許立太宗事，必係不符合事實的偽造，可以斷言。

(266)

## 五 偽造故事的原委

唐高祖於義寧元年（六一七）十一月甲子，進封唐王，即以「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太宗爲京兆尹，改封秦公。」（舊唐書高祖本紀）「二年（即武德元年）正月戊辰，世子建成爲撫寧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爲副，總兵七萬，徇地東都。」（同上）可知那時太宗的職權，仍在建成以下。同年五月甲子（二十日）高祖卽皇帝位，六月庚辰（初七日）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封世民爲秦王。從那時起，他們兄弟將來的君臣名分，作了預定。以後建成留在中央幫助高祖處理政務的時間較多，出外征戰的時間較少。太宗則東征西討，屢建軍功，大有「勳業克隆，威震四海」（舊唐書隱太子傳載魏徵語）之勢。他又結納人才，擴充勢力，他們兄弟間漸成對立的局面。經過明爭暗鬥，終於武德九年（六二六）六月四日發生玄武門之變，建成被殺，太宗由被立爲太子而卽帝位。

太宗卽位後，當然要想獲得天下和後世的人心。要達到這目的，必需要把他的卽帝位解釋爲合理合法。於是除造符命以外，還必需造出父命。造父命還要造出父命的根據，纔能使人相信，而且造一次還怕不夠。在這樣的要求下，前面所述的高祖三許立太宗的故事，自然應運而生了。

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雜錄上有云：「貞觀九年（六三五）十月，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記錄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自觀覽，用知得失。臣以爲：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至於曾元之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史官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己，唯當致怨史官……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通鑑卷一百九十七貞觀十七年記曰：「初（時間在十七年前），上（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選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圖爲高祖今上（太宗）實錄。」合以上兩段記載，可知（一）太宗於貞觀九年十月十六日出聖旨欲觀國史。（二）朱子奢諫後不久，太宗親觀國史了。（三）太宗親觀國史以後，房玄齡許敬宗等圖爲高祖太宗實錄。

按高祖太宗實錄是貞觀十四年開始修，十七年完成的。通鑑卷一百九十七記實錄修成時，太宗的言行說：「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指玄武門之變），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安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令削去浮詞，直書其事。」所謂「即令削去浮詞」就是命令再加修改了。如何修改方法，太宗當然會加以指示。

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載：「高祖實錄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齡監修，許敬宗刪改。」舊唐書許敬宗傳說：「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許敬宗對高祖太宗實錄的以己愛憎曲事刪改，已成爲後人的公論了。

許敬宗貪財納賂便妄改史事的例子太多了，例如：「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與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並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宗傳，悉爲隱諸過咎。」（舊唐書許敬宗傳）等等，不一而足。舊唐書許敬宗傳又說：「（貞觀）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校黃門侍郎。」許敬宗貪財納賂，對錢九隴、敬德等尚且「妄加功績」和「隱諸過咎」，對於當時的皇帝太宗要借以正天下人的耳目，收後世人心的大事，那有不妄加功績的道理？

許敬宗受到太宗指示後，大顯其偽造故事的天才。太宗入獄見劉文靜，本是奉高祖之命，想延攬他以號召地方武力的。（觀劉文靜對太宗之言可知）裴寂和高祖私交確很好，也曾談談過起義事，許敬宗借着這一部分事實，參以偽造，並顛倒了時間而造成太宗首謀起義一套故事來。（此非本文討論重心，從略）用這一套故事作基礎，就自然而然的造出高祖對太宗所說：「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的話來。

及高祖武德三年後，太宗確能結納人才，得到將佐的擁護，許敬宗就利用一般人在時間上的錯覺，就造出：「及爲世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立之。」的話來。但因和高祖立建成爲世子及立建成爲太子的事實不相調和，所以又加以：「世民固辭而止。」的話，也就很圓滿的轉過灣來。

楊文幹反以後，確有人妄告太子建成和楊文幹同反，致引起高祖召建成詣仁智宮，對建成世民責以兄弟不睦，流王珣牽挺杜淹於嶺州。許敬宗就把這事之前加上爾朱煥等告變等事，構成建成楊文幹同反的一套故事，順勢造出高祖對太宗說：「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的話出來。

三套故事的偽造，使當時和後世的讀者，已難免有曾母投杼之感。以後劉向作舊唐書，歐陽修作新唐書，王欽若作冊府元龜，以及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莫不採用其說，衆口一詞，似乎已達「不容置辯」的程度了。

## 六 結 論

許敬宗偽造史事的技術很高，所造故事頗爲曲折婉轉，入情近理，真假相參，隱僞於真，所以千餘年來騙住無數讀者。雖然如此，史事的真像，終難永久掩沒。

關於太宗首謀起義事，許敬宗爲加重太宗的苦心和大功，造出許多步驟和波折。正因爲步驟波折太多，纔容易露出破

(268)

統。更因他精力有限，實難處處周到，他只集中注意力於偽造史事，而不能消除足以推翻偽造故事的有力證據。（如劉文靜語），而且他只能自己獨造，無法使他人全照樣偽造，（如溫大雅全盤記起義真像）於是，他的造偽，便不能永久的掩盡天下後世人的耳目了。

關於將佐請立太宗事，許敬宗只能造出籠統而空洞的幾句話，却不能把其他有關的人，有關的事，有關的時間全都修改（事實上無法盡改），所以所造的故事，還是不能成立。

關於建成被楊文幹反牽連事，許敬宗爲要修改成爲建成與楊文幹同反案，所以造出爾朱煥告變等事，但是正因爲如此，纔和韋挺等傳裡所記發生矛盾。而且他只能刪改同時人所作的詳直（如刪改敬播所作），沒有方法能約束得住後人的直書（如劉餗的小說），所以雖然許敬宗用盡苦心，終難掩蔽得住他造偽的真像。

根據以上，可作一結論說：唐高祖三次許立太宗的記載，全係許敬宗在實錄裡爲迎合太宗政治上的需要而偽造出來的。